

亚洲讲稿之一

学习邓小平

刘亚洲

1999·3·北京

~~信与通社~~

2002年5月17日 昆明基础

① 昆明之行 讲话提纲

~~一 昆明之行 讲话提纲 讲话稿~~

① 中国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

(△ 对WTO的机遇与挑战 /

贸易争端 / 美国的挑战)

第二次: "澳门的机遇与挑战..."

昆明之行讲话

△ 一 讲话稿, 2002年5月17日

△ 讲话提纲: "澳门的机遇与挑战"

△ 讲话稿, 讲话稿

△ 讲话稿

刘亚洲讲稿提纲手迹

编者按

我编辑部刊印了《亚洲思想库》，反响巨大。现又将刘亚洲将军近年来的讲话、讲座收集整理，冠以《亚洲讲稿》之名，内部刊行。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特此说明。

《国家战略》编辑部

2005年9月

前 言

这是刘亚洲在北京军区空军师以上干部邓小平理论学习班上的讲话。

学习邓小平

刘亚洲

1999 · 3 · 北京

目 录

| | |
|-----|---------|
| 1 | 学习邓小平 |
| 第一章 | |
| 11 | 物质现代化 |
| 第二章 | |
| 30 | 制度现代化 |
| 第三章 | |
| 45 | 人的现代化 |
| 附录 | |
| 61 | 初谈“六·四” |
| 63 | 起因 |
| 75 | 较量 |

军区空军举办邓小平理论学习班，我来给大家谈谈对邓小平同志的理解。在开始的时候，我先讲一件题外的事。最近机关给处以上干部分配了住房。乔迁之喜。装修各显神通。昨天，一个处长请我参观他的新居，我去了。房子装修得甚为富丽堂皇。窗明几亮。他喜滋滋地指引，我喜滋滋地参观。我分享着他的喜悦。可是，我渐渐发现一个问题：在他那装修华丽的新房里，居然看不见一本书！我把他所有的房间都看了，真没有。我心里涌上来一阵巨大的悲哀。

这就是我们的师职干部呀。我想起最近在社会上很流行的一句话：“酒比西装多，西装比电器多，电器比书多，没看过的书比看过的书多。”还有一句话：“印好的书一半没卖出去，卖出去的书一半没有人看，看了的书一半没有理解，理解了的一半理解错了。”过去党内有句话：“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为什么说赶不上刘少奇呢？因为刘少奇当时被看作党内的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风靡一时。我在这里想说这么一句：今天不看书，明天就落伍。不读书，赶不上时代的脚步。

我密切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出现了一大批“多余人”。你们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这是我的研究成果。举例说明：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时，鸡肉鱼蛋供应全部配给，由国营的副食品商店统筹。现在满大街都能买到鸡肉鱼蛋，

副食商店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国有企业也是这样，产品无处卖，也成了多余的东西。职工下岗，成了多余的人。由此而延伸开来：机关有多余的人，厂矿有多余的人，军队有多余的人，甚至政府里也有多余的人。怎么解决这批人的问题，是个头痛的事情。多余的人太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是：全是“混混”。今天中国已快被“混混”取代了。甚至不止今天，中国几千年，“混混”大行其道。不读书，或读死书，或读坏书，是“混混”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像《论语》、《道德经》就不是什么好书。《史记》是好书，但《资治通鉴》就很难算是好书。

“混混”太多，中国根本发展不了。中国的封建社会那么长，用我的话说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特别漫长，不能说与此无关。试看我们平时用的东西，哪一项是自己发明的？除了筷子。没有发明，只有模仿。但模仿也上不了档次。模仿

最好的是日本。中国的模仿基本是制假造假。作家写不出警世之作，理论家写不出警世的文章。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大部分在取媚领导。大知识分子取媚于大领导，小知识分子取媚于小领导。处在今天这个社会中都写不好这个社会，要写好今天大约要到四百年以后。《水浒》是部传世之作，但在它成书前，整整在老百姓中传播了四百年，是积四百年之厚而发。它实际成了中国老百姓的理想化身：选领导就要选宋江这样的人，无甚大才，但能笼络人心，小恩小惠；当和尚要当鲁智深这样的花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当英雄要当武松这样的英雄，有一个美如潘金莲的姑娘去勾引。现在是市无“才商”，学无“才儒”，甚至连“才偷”都没有。干坏事都干不出名堂来。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当“混混”呢？怎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呢？读书。唯有读书。读好书。小平

理论就是一部好书，一部大书。

中国不幸，有了孔子。中国有幸，有了邓小平。过去有句话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今天我要说这么一句：“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新新中国。”领袖是要解决课题的。领袖只有解决了课题，才能当之无愧地称为领袖。毛主席解决了课题：建立新中国。这是开天辟地。邓小平解决了课题：改革开放。这是改天换地。胡耀邦解决了课题：平反冤假错案。就是华国锋，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也解决了一个课题：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而且越是随着历史推移，它的伟大意义才越发凸现出来。我正在撰写一本书，名字叫《1976年10月6日》，反映的就是这段史实。我是沉淀和思索了二十年才开始写这本书的。

毛主席是伟大的，但邓小平更伟大。中国有今天，中华民族有今天，得益于

毛主席，更得益于邓小平。如果非要让我说毛泽东和邓小平哪个更伟大，我的看法是：邓小平比毛泽东伟大。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绝不掩饰我的观点。为什么我说邓小平比毛泽东伟大？让我来给你们解释：在中国历史上，毛主席的确是人中龙。他光芒万丈。他魅力四射。文韬武略，都尽其极。你看看他的诗词，看看他的书法，端的是神品，人间似不可得。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毛泽东有可比性。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但并没有砸烂旧世界。酷烈的“文化大革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告诉后人这一点。他学的是旧思想，行的是帝王术。武功再高，上有成吉思汗；文韬再盛，前有唐宗宋祖。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人，而邓小平是中国新形态社会第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直在研究毛泽东，我的著作《广场》被海外称作是研究毛

泽东诸多著作中很具特色的一部。终其一生，毛泽东没有跳出中国社会封建形态的圈子。在这一点上，不要说他不如邓小平，他甚至连今天我们具有现代思想的普通平民也不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据说读了二十多遍。我认为他钻进去了，深深地钻进去了。但没有跳出来。他的睡床有一半是放着这部书的。《资治通鉴》可是“独夫的家谱”，里面那些封建糟粕，全被他老人家学进去了，并以此来统驭全党，统驭社会。他的思想体系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此书。我作为一个才疏学浅的后生，不夸张地讲，《资治通鉴》也读了二十余遍了，但我感到我跳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愈读愈觉得恶心。书中那些血淋淋的帝王术，残酷而触目惊心的宫廷斗争，无耻的腐朽的封建文化，毒害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心灵的传统理论，无不让我产生想呕吐的感

觉。它是“相斫书”嘛。我不能在吃饭时读《资治通鉴》，那会让我无法将饭菜下咽。我越读越觉得书中几无一处可取，越读越觉得应当以那个社会为镜子，正衣冠，正人心。王震同志曾讲过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好哇。文化大革命好就好在让人民认识到这样的革命再也不能进行第二次啦。”王老的话是《资治通鉴》的绝妙注脚。

邓小平则不同。看上去他的才华不及毛泽东。他不善言辞。书法平平。从不做诗。但他的思想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中国大地。他的思想是一把利剑，将封建的中国刺得流血。他斩断了粗壮的中国封建母体的脐带。他是新中国第一人。我对他满心崇敬。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高峰，邓小平理论是新高峰。“攀登新高峰”是日本特遣舰队向珍珠港发动奇袭时的行动代号，这句话今天可以作为我们向新世纪迈进的代号。

在我党七十余年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有过两次结合：一次是建设新中国，一次是改革开放。产生了两个理论：一是农村包围城市，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两次飞跃，推出了两位领袖。其实两次都与土地有关：农民为什么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土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整顿溃败的军队，而是土改。因为他们认真总结了丢失大陆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给老百姓土地，赢得民心，继而赢得天下。人民为什么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让他们拥有私有财产。江泽民正式提出“三位一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是江总书记对历史的贡献。

我通过学习，有这样一个看法，邓小平理论有三个核心，即三个“现代化”：物质现代化，讲的是物质文明；社

会结构现代化，讲的是制度文明；人的现代化，讲的是精神文明。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性建设，制度文明是关键性建设，精神文明是目的性建设。

一、物质现代化

邓小平在 1984 年提出了一个世纪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要搞清三个“什么”。第一，什么叫社会主义；第二，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第三，什么叫资本主义。小平同志是传统观念最大的反叛者，他特别敢于思索新的问题，敢于解决新的问题，我们和小平同志处在同一代的人，都深深感到这一点。他首先是敢想，其次是敢为。你不敢想，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整个中

华民族的悲哀。我们被传统的观念束缚得透不过气来。“一国两制”你敢想吗？你不要说做不到，你想都不敢想。有一点新的观念和新的思想，历来被视为大逆不道。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在幼儿园上大班的时候，老师问，孩子们，说说你们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孩子甲说，长大了我要当飞行员；孩子乙说，长大了我要当科学家；丙说，我要当解放军。这个时候，有一个孩子说：“老师，我长大了要当毛主席！”一句话使幼儿园老师惊黄了脸，瞠目结舌，害怕得差点哭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孩子非常好。至少他的念头很伟大，很出色，很出众。为什么能当飞行员，就不能当毛主席？刘邦和项羽都说自己要当秦始皇，后来两个人都当了。我太羡慕先秦的中国人了，他们的思想和今天的我们——他们的子孙，太不同啦。先秦时代，人的思想无拘无束。每个人，不论他们的哲学、道德、

政治主张何如，都在直面自己内心的一份真实、一份灵气、一份天性，而不是臣服于被权威和流行设定为准则的那些理念。他们是高山，我们只是一抔黄土。我不知道在后来漫长的人生经历中这个孩子的思想是否起了变化，几乎可以肯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的思想棱角会被磨平，削去。这种大胆的想法不可能贯穿他生命的始终。然而，唯一可与先秦古人媲美的是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他就敢想。他的所有的念头都大胆得出奇。淮海战役时，行军打仗那么激烈，邓小平每到一地不是研究军事，而是找人打扑克。小牌局赢了，大牌局照样赢。在这点上，我们真是要学习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与毛主席的经历不同。毛主席崛起于垄亩，扎根于中国大地，一生只去过苏联两次，而小平同志是出过国留过洋的。他是属龙的，当他离开广安这片养育他的土地，顺江而下，就

再也没有回过家。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龙不回头。他从来没有回过家乡，直到他生命的终结。出国这段历史，可以说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改变了他的观念，然后又通过他改变了整个中国。我们现在的报刊杂志、媒体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小平同志当时在法国如何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如何参加革命运动、发动工人，如何和周恩来一起发行进步书刊，这恐怕夸大了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所为。而另一方面呢，台湾的反动媒体又宣传，说小平同志当年在法国的时候不好好读书，爱看足球，爱喝咖啡，法文也不过关。二者都偏颇。但不管你是从正面说他也好，反面说他也好，都不能否认，在法国的这段历史极大地影响了他。他触摸了西方，触摸了文明。他看到了什么是富强，什么是富足。不错，他曾经是个农民，但在法国这段经历使他蜕变成了非农民。这一点对于农

民的中国实在太重要了。他大胆地向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质问、怀疑和反思。

首先，他看到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经济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相反却成了改革的对象。其次，他看到计划经济并非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日本和法国都在成功地实行着计划经济。再次，他看到土地、股票、房屋进入市场后，构成了按资分配的大量事实，使他感到按劳分配并非是社会上唯一的一种分配形式。他看到这三条之后，便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国家里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的举动——改革和开放。改革主要是改正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运用。开放则主要是纠正对资本主义的错误理解。邓小平提出了两个振聋发聩的论断：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②我们要建立对资本主义的优势，首先要摆脱贫困。真是非常深刻啊！难道社会主

义就等于贫穷吗？难道社会主义就等于集权吗？难道社会主义就等于一大二公吗？难道我们注定要吃苦吗？我们注定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吗？

托邓小平的福，今天中国已大变。昨天的中国是什么模样，很多年轻人已不了解了。然而我们可以看看北朝鲜。北朝鲜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昨天。富饶秀美的三千里江山，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集权的后果之一就是饥饿。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我去过板门店，北朝鲜在板门店的士兵全是千里挑一呀，都是从部队中最拔尖的、最帅的士兵中选出来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事实：他们非常消瘦，面有菜色。怎么了？吃不饱嘛！在第一线守卫祖国边关的士兵，尚且是这样，国民呢？饿殍遍地啊！最近中朝边境遇到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北朝鲜的难民源源涌来，越过鸭绿江、图们江到中国来。图们江有一处很浅，

枯水季节连人的脚踝子都淹不了。但就是这么浅浅的一条河，多少北朝鲜人在已经快要看到中国，看到希望的时候，就是迈不过这条河啊，饿死、倒毙在这条河里。而这些人如果被遣返回去，都要统统处以极刑。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美国夫妻到北朝鲜旅游，住进了北朝鲜最豪华的宾馆里。这对夫妻发现宾馆没有双人床，只有单人床。他们向宾馆提出要求，说：“我们是夫妻，我们要睡在一张床上。”这个酒店的管理人员来了以后，指了指墙上，墙上挂着慈父般的领袖的像。这画像无处不在。管理员说：“我们不能不挂这张像，而我们挂了这张像之后，你们两人能当着我们伟大领袖的面做床第之间的事情吗？”让人笑掉大牙。这就是社会主义？但这不是笑话，是真实的事情。这样的社会主义，不要也罢。

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

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它的消亡是必然的。这个阵营从来没有团结过。其实，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充满了不信任。李先念主席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访问过北朝鲜。一天早晨，李先念穿鞋的时候，觉得脚板底下有点不对劲，像粘了什么东西，抬起来一看，鞋底粘着一个很薄的东西，几乎和纸一样薄。蹭了两下，没掉。李先念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李先念的警卫秘书曾庆林过来，他有经验，把那东西刷一下撕掉了，带回来。同志们，你们猜那是什么？窃听器。最新产品，日本的。你看，这就是“同志加兄弟”。像李先念这些领袖，对北朝鲜的支持是无条件的。当年我到南朝鲜开展对韩国建交工作的时候，都是瞒着李先念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当时知道了我到南韩的消息后，讲过这么一句话：我和李先念主席私人关系这么好，他女婿到汉城去干什么？同志们，朝鲜领导人到中

国访问居然还带着水，不敢喝中国的水，认为中国的水不卫生。

小平同志在指出了前面两点之后，进而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今天我们摒弃计划经济，并不是批判它，也不是否定它曾经起过的巨大的作用。计划经济的失灵在于它的实施必须具备两个苛刻的条件：①计划部门掌握全部的市场信息；②整个社会利益一元化倾斜。应当看到，计划经济仅适应于战时的紧急状态和经济的大规模恢复时期。计划经济属于权力经济、命令经济。它以配额代替选择，以统管排斥竞争，违背了客观规律。世界现代史证明，哪个国家不搞市场经济，哪个国家就落后。十八年的中国改革史证明，哪个地区搞了市场经济，哪个地区就迅速发展。话说到此，有些人会问：五十年代中国搞计划经济，社会那么稳定，人心那么整齐。今天搞市场经济，人心

不稳，社会混乱。这话看似在理，却不能深思。五十年代是稳定，但这种稳定是以人民的普遍贫穷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心灵摧残为代价的。

心灵摧残是最毒辣、也是最根本的摧残。有些事情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我1968年参军，那时我十五岁。我对部队里有些现象非常震惊。我们那时候发毛主席像章，有些战士把毛主席像章不是别在衣服上，而是别在胸口的肉上。为什么？要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要见血啊！我爸爸到部队去，问战士，你们把毛主席像章别在心口上，痛不痛啊？战士一扬头：“不疼！”那能不疼吗？入伍第二年，我所在的部队去陕西安康支农。夏天某日，火辣辣的太阳挂在空中，农民在地里劳作。一个老农挥汗如雨，仰起头来擦了一把汗，说：“哎呀，他妈的，这太阳真毒啊！”就这一句话，判了死缓。为什么？太阳是什么？太阳是毛主

席啊！你怎么能骂这太阳真毒啊？你什么意思啊？死缓是轻的，对吧？今天，我给儿子说起这个故事，他不能理解，但是我们过来人，人人都能理解。可能是会心一笑，也可能是苦涩地一笑。我后来在空军联络部工作，听说了一件事：上级发了纪念章，一个干事把纪念章拿到办公室来，纪念章每人一枚，他说：“来啊，同志们，咱们坐地分赃！”就这一句话，判刑。真是噤若寒蝉啊！稍不注意，就可能出大问题。你们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空军政治部某部有人专门盯你上厕所。那时候没什么草纸，都用报纸擦，等你擦完屁股从厕所里出来，他进去了。他进去干什么呢？他去翻纸篓，看看擦屁股的报纸上有没有毛主席语录，或有没有毛主席的头像，如果有，大逆不道。这一幕情景回想起来真是非常可怕。同志们，今天我们有一句话，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

话从某种意义来讲是一个进步，说明我们敢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那时有心里话，你敢讲吗？

小平同志提出要重新看待资本主义。第一，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期的资本主义了。马克思是身在资本主义而解剖资本主义，瞻望共产主义。他跟牛顿一样，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马克思绝不可能在封建社会，绝不可能在中国研究资本主义。况且，现在的资本主义和他写作《资本论》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具备公有制性质。我到德国去，德国很多朋友最爱讲的一句话是：现在看来最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有可能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第二，社会主义研

究资本主义不多，但是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研究社会主义。美国从1910年起就提出国家宏观控制的理论，这就是说，它也是有计划经济的。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派人去苏联，研究苏联的计划经济。罗斯福想解决一个疑惑：为什么看似险恶的社会主义苏联能够战胜强大的德国法西斯？苏联战胜德国，是计划经济起了作用。损失那么多飞机、坦克，由于有计划经济这个杠杆，源源不断的飞机、坦克制造出来送到前线。美国从苏联学习了不少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比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强。日本的国家调控占经济的百分之七十八，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的。

据此，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新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

加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小平同志这“三个有利于”刚提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左派曾提出反对意见，说，如果按你的三条标准，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岂不都是社会主义了吗？小平同志没有与其争论，而只进行了比较。小平同志是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来进行比较的。纵的方面，就是针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教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发展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条，虽然说现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你不够格。小平同志这些话层层递进，非常深刻。你认为你搞的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说，你根本不够格，你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那就带来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不是资本主义，这没有问题，小平同志又讲我们连社会主义都不够格，那我们是什么呢？我看充其量是封建主义。横的方向和资本主义

国家比。小平同志的观点就是，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和水平的話，那就一定会发生命运危机。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形象的话是什么呢？“开除你的球籍”。他进而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这句话被写在深圳市主要街道的大标语牌上，时刻警醒着我们。这话虽然浅显易懂，但它折射了小平同志的深邃思想。他触摸到了一种永恒的追求。我们过的不是原始共产主义。我们的目的是发展，是富足，是过好日子，是自由，这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吃饭、穿衣、花钱、住房、爱情，包括爱情的自由，它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和人类的本质要求。这是一个人的目的，也是一个族群的目的。只要你承认这一点，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都可以。

当然，在小平同志思想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小平

同志的物质现代化理论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共同富裕。马克思也提到过共同富裕。但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大一统的平均主义，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个时候的中国只有共同贫穷，根本谈不上共同富裕。而小平同志的功绩并不在于提出和确认共同富裕的目标，我刚才讲过，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他的功绩是在于终于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是什么呢？中产阶级。中国是需要一个中产阶级的。首先，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稳定。“六四”时，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应当越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可那些地方最稳定，如广州、深圳。这就是因为那些地方已接近出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比较成熟，文化层次高。“六四”刚过去两个月，我就在一次谈话中谈到这个问题。（谈话附后——

编者注) 列宁说：“无产阶级的领袖不能从无产阶级中产生，而应当从有产阶级中产生。”其次，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社会越发展，这一点显得越重要。对这个问题，我还在进行思索。文革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1975年学大寨的会议上，小平同志提出，现在农民普遍贫困。江青是非常反感小平同志这个论点的，江青说，什么普遍贫困？那是少数！小平同志不客气地回敬她：“少数？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贫困也不行！”斩钉截铁。

当然，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公务员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座的都是公务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其实只做着一件事：使人民从无产变成有产。但是这是以牺牲相当一批国家公务员的利益为代价的，要求国家公务员绝对贫困。比方说，一再限制公务员经商。那么，公务员是不

是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从无产变为有产呢？怎么才能由无产变为有产呢？贪污肯定是不行的，高薪行吗？也不行。这个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绝对的权力使人腐败，但是绝对的无权也使人腐败，因为二者都容易使人相信权力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它，才可能前进。地方改革目前已深刻地影响到军队。国企改革直接影响到军人家属的就业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直接影响到军人转业的安置问题；分配制度的改革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军人的切身利益。现在工人有股票，农民有土地，据说公务员也可有房产，而军人则什么也没有。说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即发明、技术、信息也可以参与分配，但军人还是不行。济南军区一科技人员发明一项尖端技术，台湾人想出五百五十万买，他不卖，说：“因为我是军人。”济南军区副政委张文台说：“我

什么也无法给你，我给你敬个礼吧。”那
科技人员泪流满面。

二、制度现代化

目标和目的一旦确认，就需要有制度上的保证。没有制度上的保证，目标就是沙盘，目的就是纸上谈兵。小平同志在思考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在认真思考制度问题。他一面着手进行经济改革，一面准备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否则，落后的政治体制会对先进的经济体制形成反噬，直至吞没经济改革的成果。只有经济现代化，没有政治现代化，就是

瘸腿的现代化，甚至不算真正的现代化。毛泽东去世前，曾问王洪文和邓小平：“我死了以后中国会怎么样？”王洪文答：“全国人民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革命。”邓小平瓮声瓮气地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毛泽东称赞邓小平说得好。邓小平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因为他看到毛泽东是以个人意志统驭全党而不是依靠正确的政治制度治理党和国家，所以才如此预言。过去中国出现的错误和偏差，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统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恣意横行。制度坏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做好事。国家越是贫穷，越是动荡；越是动荡，就越是专制；越是专制，就越是贫穷。这三者互为因果。

谈到制度建设，我们不能不谈到苏

联。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复制过来的，而今天在苏联，那个制度已不复存在。布热津斯基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人类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苏联社会主义是伟大的理想，伟大的实验，但不幸失败了。它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根本一点是它否定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贪欲。恩格斯说：“贪欲是杠杆，推动历史。”同志们，人生下来，紧攥着拳头，标志着一生中他要抓住什么，握住什么；人死时，手松开了，表示他已放弃一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恰恰在这一点上违背了自然规律，违反了辩证法，所以它失败了。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的消失。前东欧共产党集团控制国家一般用两手：一是政治，二是经济。政治就是意识形态，就是人们的信仰。第二就是经济。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共产党用了两手。经济上虽然毫无起色，

甚至贫困，但只要意识形态没有发生问题，统治就能够继续。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这样。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啊。现在我不叫它自然灾害了，其实那三年是人为灾害，因为那三年实在是风调雨顺的。我祖籍安徽，据说那三年安徽省饿死的人比解放前饿死的人的总数还多。有的村庄都空了。十室十空。李先念主席到河南信阳去，村庄里哪里有冒烟的？只要哪个村里有冒烟的，那一定是煮人肉吃啊！人饿死之后，亲属把他埋了，要在旁边坐着守护。为什么？你不守护马上就有人把这尸体挖出来吃掉了。你看看人饥饿到什么程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党的信念动摇过没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动摇过没有？我们对毛主席的崇敬动摇过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意识形态合法性还在。文革中也是这样。当然文革是一切疑问的肇始。蒙蔽

必将造成猛醒。高压必将造成爆发。文革最大的功绩就是彻底砸碎了某种东西，而使它永无复原的可能。人们开始思索，开始摸索，开始寻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动文革的人，如果不是太愚蠢，就是太聪明。那么一旦意识形态破产，政权靠什么来维持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经济，经济发展就成为维护统治的合法性的重要支柱，这样就大大加重了经济发展的压力。实际上在苏联后期，说是两手，其实只有一手。那么一旦这一手也不行，你这个统治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苏联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江泽民总书记说，每逢苏联发生大事，对中国都有影响。我的看法是，苏联对中国影响大，中国对苏联影响小。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与苏联有一种传承关系，如果没有这种传承关系，它再发生大事，也不可能有什么影响。但是从八十年代

以来，这个传承关系颠倒了。我们现在走到前头去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树立了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现在我们对它影响大。美国人和西方早就看到了苏联的问题。西方在苏联解体前曾经做过四种假设：不变质，不垮台；不变质，但垮台；变了质，不垮台；又变质，又垮台。现在看来中国是第一种，苏联是第四种。我们要感谢小平同志啊！苏联的失败是悲壮的。应当说苏联共产党悲壮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尽到了国际主义义务。在抗击法西斯的战争中，它死亡的人数最多。我们现在说中国死亡的人数最多，不对。苏联死了两千多万人，而且都是精英。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战场上捐躯的。而我们呢？抗日战争结束六十年了，我们死亡的人数还在不停地增加。我记得刚解放的时候，讲的是抗战八年中国军民牺牲八百万；到了文革前后，我们在抗日战

争中牺牲的军民就是一千万了；改革开放初期，这个人数已经达到了两千万了；前不久，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说是中国军民死亡三千万。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人还在死。是果戈里说的“死魂灵”吗？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之后，苏联人民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还支援中国。苏联共产党在“八一九”事变中还进行了最后一击，但失败了。对于苏联共产党解体的教训，我一直在研究。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谈“八一九”事件。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苏联解体之后，它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这个制度是苏联人民的选择，无可厚非。其次，应该说它现在选择的这个制度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苏联解体之后，前共产党人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仍然能以共产党的旗号进行活动，参加政治。这与当年苏联共产党掌权后

千百万人头落地，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一个进步。波尔布特是东方的斯大林。斯大林的大清洗，不仅是苏联的耻辱，更是人类的耻辱。回顾一下那段历史，触目惊心。苏共解体的隐患，是从当年斯大林大清洗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的。一百三十九个中央委员，枪毙了九十八个；十五个军区司令，枪毙了十三个。八十五个军长，枪毙了五十七个。这样残酷的令人发指的政权，它难道能够存在吗？它不灭亡，天理不容。

再来看看我们中国，看看我们党的现状。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使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产生了巨大活力，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封建社会非常漫长。如果说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只有几百年的话，中国的中世纪大约有两千年。中世纪是全人类最黑暗的时期。中世纪

之前是人类思想文化最灿烂最辉煌的时期，东西方基本同步。西方是古希腊，东方是中国的春秋时代。东西方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也基本同步。但是西方走出中世纪要早，我们则晚得多。西方是文艺复兴时就走出了中世纪，我们是百年前刚走出来。两千多年来，不光是中国，整个亚洲大陆，实际上是一直笼罩在专制主义和集权的冬天里。在这里，力量是上帝，而不是上帝是力量。

前不久，我和国防大学的几个教师发生争论。他们认为，美国已经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主要针对中国。我的看法不一样。我始终认为美国不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它的战略重心一直在欧洲和中东，这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不完全是资源。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美国的重心在欧洲呢？因为他们与欧洲打交道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他们认为亚洲的民主不够，思想与他们

有距离。有些观念他们是无法接受的。有时候从经济利益出发，美国不得不跟亚洲打交道，但从战略利益出发，它是不会把重点转移到亚洲的。

我们的制度有极大的改善空间和改革空间。这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党内极左派曾反对小平同志这个观点，他们的论据是：虽然发生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浩劫，但浩劫之后是春天。这说明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我当时讲了一句话：如果一个制度能一个接一个地制造冤假错案来证明自己的正确，然后再逐一地平反来证明自己的英明，那么，它还是英明和伟大的吗？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酷烈程度，超过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苏联的问题是左。中国的问题是极左。我们和苏联不一样，苏联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中国的党基本是农民党。我们夺取政权以后变成了“无产者贵族”。失去了无产者的

质朴，而留下了它的粗野；没有学到贵族的高雅而学到了它的骄横；是二者的恶性结合。有知识没有智慧，有情绪没有情怀，有信心没有信仰。我们这个制度产生出什么样的干部呢？斯大林把人才当奴才，勃列日涅夫把奴才当人才，二者都是对人才的反动。再看看我们军队前些年被某某把持时的现状，一句话，逆向淘汰。用的是庸才，走的是人才，提的是奴才。提干部重德不重才啊！那个德也是假德。在部队中学雷锋的标兵大部分都留下来，但是思想新锐的，有锋芒的人不见容于部队。提得快的不一定是干得好的。提得最快的不一定是干得最好的。今天，我党已经开始从基层、乡村开始了选举，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这是邓小平理论中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但要做好这件事很难啊。同志们，我们要是真的进行选举的话，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

有道是民主国家人民用手投票，专制国家的人民用脚投票。中国人民用手投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用脚投票。什么叫用脚投票？出走啊。解放初期，我们也搞过选举。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苦口婆心地去给群众做工作，做什么工作呢？不是让他们选自己啊，是苦口婆心给群众做工作让他们选民主人士进政府啊，否则群众就不选他们。那时候群众对共产党太爱戴了。

刚刚闭幕的“十五”大上，有好几个干部子女落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些干部子女据我了解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代表不选他们？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我大胆问一句，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几个干部子女到厂矿、到农村去的呀？有一个统计，县处级的干部子女占在职岗位人口的十万分之九点二，但是在金融和商贸系统工作的，占了岗位的百分之七十八以上；正厅级的干部子女占在

职岗位百万分之十八点五，但是在金融和商贸部门工作的，占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省部级的干部子女占在职岗位人口的百万分之七点一，但在金融和商贸部门工作的，占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大约有七百三十名左右，除了一百五十七名在党政军各部门工作之外，其余的五百多名全都在工商、金融、外贸系统担任领导职务。这难道不是腐败现象吗？腐败问题是困扰着我党的一个重大问题。对腐败的抵制反映了我党的执政能力。到今天，腐败呈现“四化”：公开化，社会化，法人化，时尚化。腐败分子有一种前仆后继的精神。中国反腐败的力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但越反越腐。反愈烈，腐愈烈。大有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站起来之势。改革开放以来，受党纪处分的党员是七万人，占全国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一点二。这是一个什么

概念？即每一百个党员中就有一个半人受处分，其数字相当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全国党员人数的总和。1978年以来县团级干部受处分人数两万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建国初期，我党一共拥有县团级干部两万人。正是这两万人，接管了全中国五百座城市。世界反贪机构已把中国列为十大贪污国，目前排名第二，第一是马来西亚。有人建议把中国排第一。江总书记最近讲，有两个问题使他睡不着觉，一个是国企改革，一个就是腐败。“十五”大上，江总书记讲到“党内绝不容许腐败分子藏身”时，全场鼓掌三十七秒。人心向背，可见一斑。我们要时刻扪心自问：我腐败了吗？我反腐败了吗？一个人干一辈子坏事不容易，但干一两件坏事很容易。在座的都是师以上干部，在这样的职务上，干点坏事易如反掌。我们必须用良心和道德来约束自己，但最重要的是追求和建立一种

制度，彻底根除腐败的土壤。惩治腐败并不能根治腐败，这是我的一贯观点。只有老老实实从改善和改变制度入手。宣传“清官”是苍白的。自己当“清官”也是无助的。在封建社会里，清官反而是帮凶，制度的帮凶。“清官政治”是为家天下服务的。“清官乃不祥之物”。

三、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也就是精神文明。我讲三个问题：

(一) 文化建设

文化这个东西，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我一直在思索，中华文化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没有问题，中华文化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但是它的糟粕也不少。中华民族形成今天这种精神状态，形成这么一个种群，文化起了

决定性作用。这个种群是优秀的，但并非最优秀。坦率地讲，我们的文化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宗教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信仰也是有问题的。民族与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最初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最后的竞争也是文化的竞争。到中国大街上去和到外国大街上去，最大的区别就是汽车。中国的汽车大都贴着膜，把自己封闭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心灵的封闭。外国的汽车从不贴膜或挂窗帘。这是文化。汽车贴膜和四合院、长城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中国人生活稍好一点，保健品就大行其道。西方人生活好了，则是健身大行其道。这也是文化。外国人以晒黑为美。中国人以白为美。这还是文化。美国人以为别人都会说英语。中国人以为别人都不会说中文。这仍是文化。但是今天我不深谈这个，我讲文化建设，主要还是指的是文化知识。小平同志的精神文明理论中讲的文化建

设是指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文化知识不代表文化的全部，但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点上，我们近代做得是不够好的。日本人曾讲过这么一句话：当年我们发动侵华战争，也就是你们说的抗日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你们的大学还在开课，可“文化革命”中，你们的学校却停了课。这是对民族的犯罪。

小平同志的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就拿刚才我讲的政治体制改革，小平同志早就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未必看不到普选、直选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小平说中国下个世纪的中叶才可以进行普选。我一直在思考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等待那么久的时间。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还不够高。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广大的农民，还处于一种蒙昧状态。蒙昧是专制的母

亲。前不久，贵州某偏僻山区遭灾，省政府送去救灾物资，农民拿到政府的救灾物资后，非常激动，含着眼泪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一幕极大地刺激了我。这与西藏一些藏民家挂华××的像有什么区别？我们的人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混沌的状态呢？我们的干部有种种不足，最根本的是文化底蕴的先天不足。这个文化指的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素质。我们的知识结构不足以使我们担当起改革开放的重任。我们的文化素质不足以使我们跟上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的大潮。因此我说，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个路的尽头，便是对中国文化的终极拷问。自鲁迅之后，林语堂、柏杨、胡适、黎鸣等一大批先驱者，正在用智慧的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直觉告诉我，在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这代人要承担起反思的历史使命。

（二）素质建设

个人的素质决定着集体的素质。集体的素质决定着民族的素质。民族的素质决定着民族的命运。美国是个法治社会。中国是人治社会。法治社会人人自觉，人治社会人人不自觉。素质高的民族往往是这样的：在可以选择的时候，选择自由；在不可以选择的时候，十分守法。素质低的民族则相反。权大于法，是对法律的践踏。“从重从快”，同样是对法律的践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也是这样。我曾关注过一种投资现象，很有意思。到中国来投资的商人人数最多的是港台的，其次是韩国，再其次是日本，再其次是美洲，最少的是欧洲。但是最循规蹈矩的却恰恰颠倒过来。欧洲人素质最高，接着是美洲、日本……港台人最差。这是世界的不幸还是中国的不幸？目前世界经济领域内的大趋势是

“强强合并”。现在全球五百强的大公司中，美国占一百五十家，日本占一百三十家，中国只有两家，一为中国银行，一为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这两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而是政府机构。中国现在有一千多家汽车制造厂，大的有三家，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大的年产十几万辆，小的年产几十辆。现在把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的有二十多个省市。这样的产业结构在世界上有什么竞争力？

今天在座的全是共产党员。党员的素质体现在何处？我认为体现在对党的信仰上，体现在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上。“意志坚定，永不叛党”，这是我们每个党员在入党时的誓言。人民迷惘，但党员必须清醒。文化大革命彻底摧垮了人民的精神信念，但它尚未建立起新的东西。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打败国民党和发动文化大革命，这

是他自己说的。这两件事情都是破坏性的。第一件对，第二件错。而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包括他的思想和理论，则都是建设性的。党员的最高素质体现在政治合格上。我常说，政治上合格，百分之八十不行，百分之九十不行，百分之九十九也不行，非百分之百不可。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坚定的人是邓小平。意志最坚强的也是邓小平。他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处处皆为人表率。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四人帮”跳梁，黑云压城城欲摧。邓小平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会场一片哭声，全国一片哭声，但邓小平一滴眼泪也没掉。他把悼词念得铿锵有力。当时我看电视转播，直直地感到他不是念悼词，而是在念一篇战斗的檄文。他被毛泽东剥夺一切职务后，只保留党籍，去广州休息。广州的老同志们谈到局势，无不忧心忡忡。一个老同志说：“看来这一回江

青他们是胜利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胜利？他们的胜利是哭胜！”八十年代初期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香港回归问题，“铁娘子”蛮横地说，共产党如果非要收回香港，香港的所有的商人和公司都会跑光。届时，香港就会变成一座空城。邓小平说：“空城也要！”后来他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我们刚刚用一秒钟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让我们用两秒钟来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吧。”什么叫坚定？什么叫大气？邓小平然也。

红军长征在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进军河西走廊，结果惨烈地失败了。我岳父当时是红三十军政委。他给我讲：沙窝分兵时，他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山头上开会，是晚上。天亮之后，往山下望去，哎呀，密密麻麻全部是红军的尸体。悲壮至极！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二十九岁，是我岳父的战友，兵败被俘，被马匪军

押到西宁，用大刀残酷地劈死。他的妻子王某某，江西人，是西路军妇女团的副团长，已有身孕。孙玉清牺牲后，她也被俘，被逼迫当了马匪军一个军官的小老婆。她忍辱负重，把孙玉清的儿子生下来，接着瞅准一个机会，带着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讨饭回到江西。在悲惨的岁月里把孙玉清的儿子抚养成人。解放后，就因为她被俘这段情节，既不承认她的党员身份，也不承认她的红军身份，更不承认她的干部身份。她坚持活了下来，默默在田间劳作。她靠的什么？全凭对党的坚强信念。一直到前年，就是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由于中央的过问，才恢复了她的三种身份。她领着孩子，孙玉清的孩子，来到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省临泽县烈士陵园。那座陵园里埋了三个红军军级干部的尸首：董振堂，孙玉清，熊厚发。在烈士事迹陈列室，她见到了挂在墙上的孙玉清的

照片。孙玉清牺牲时不到三十岁，英气勃勃，年轻欲滴。他的生命定格在最佳的青春状态。永远青春。而她，八十余岁，鸡皮鹤发，老态龙钟。孙玉清的儿子也六十岁了。由于生长在农村，也是一头白发，皱纹满脸，一步一颤。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令人心酸了。她久久凝视着她丈夫英武年轻的面孔，老泪纵横。她说：“玉清啊，我对不起你。我到现在才来看你。你的儿子都老了啊。”在场的人无不泪下。这个情景我是在电视中看到的，当时我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儿子还小，诧异地问我：“爸爸你哭啦？”我连忙把头转向一边。

（三）道德建设

中华民族道德沦丧是千年的事，而不是近百年。《道德经》是最大的不道德。《论语》无语。《大学》无学。《中庸》平庸加昏庸。我不可能在此鞭笞全部不

道德的现象，今天主要口诛假话。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最大的不道德就是说假话。网上有个玩笑，其实也未必是玩笑：一、某新闻社：能不说真话就不说真话。二、某日报：能说假话绝对要说假话。三、新闻联播：能说假话绝不说真话。四、某访谈：能说真话也不能说真话。五、实话实说：能不说实话就不说实话。六、天气预报：能不说假话就不说假话。前不久，杨白冰同志回到他的家乡重庆潼南县，对县委领导深有感概地讲道：“现在有乱讲话的，不讲话的，讲假话的，就是没有讲真话的。”他不在领导岗位上了，反而吐露真言。你们都知道，我坚决反对假话。我从来讲真话。我的信条是：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说谎一定是犯罪。为什么我敢讲真话？因为我无私。无私才能无畏。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在人之上，要视别人为人；在人之下，要视自己为

人。凡事说是的不一定是好下属，凡事说不是的不一定是好上司。为什么我会无畏？因为两条：

第一条，我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才敢讲真话。我有信仰，而且是真信仰，不是伪信仰。信仰是一套精神系统，一套价值体系，是一种内心的渴求。信仰是最大的政治。军队越现代化，就越需要政治化。刚才我谈到了腐败。说假话当然是一种腐败，甚至是更高层次的腐败。说假话就是对领导进行精神贿赂。精神贿赂比物质贿赂危害更烈。和珅对乾隆进行的就是精神贿赂，几乎把一个国家倾覆。乾隆富有全国，和珅用物质贿赂能打动他吗？当然不能。我认真做过研究，贿赂这种行为已成为中国民族性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平民百姓、官僚贵族、皇亲国戚，都习惯于这种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行为特点，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族

性格中的几个消极方面：个人利己主义、不愿斗争的投机心理、缺乏光明磊落的人格、缺乏是非观念和正义感、缺乏自尊和独立的人格。精神贿赂是贿赂的首恶。

第二条，我太热爱这支军队，太热爱这个党。我对一位领导同志说过：如果共产党完蛋了，流第一滴眼泪是我，流最后一滴眼泪也是我。我进而又说：流第一滴血的是我，流最后一滴血的也是我。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叶剑英的儿子，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兄长，他曾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时时萦绕在我脑海中：“我们这些人都在共产党这条船上。如果这条船沉了，大家一起完蛋。”我们在党，在军，就要为党，为军。坚决反对两面三刀。要提倡一个口号：老实，老实，再老实；真实，真实，再真实。军队就是我们的家，最温暖的家，离开这个家我们还有什么？我再讲一件

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张家口市张北县发生了大地震。部队连夜赶去救灾。张北县大河乡有一户人家，父亲、母亲、加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没有别的爱好，唯特别喜爱解放军。他爸爸为他置办了小军装、小大檐帽，领章帽徽。地震之夜，母亲和小男孩被坍塌的房屋压死了，只有爸爸活着。部队是凌晨赶到大河乡的，恰逢这户人家下葬。爸爸埋了妈妈之后，抱着五岁的儿子的尸体痛哭。孩子穿着平素最喜爱的绿军装，戴着大檐帽，缀着红领章、帽徽。俨然小兵。孩子宛如熟睡了，闭着眼睛依偎在爸爸的怀里，神态安详极了。爸爸一身重孝，白衣白帽，抱着孩子哀哀哭泣，痛不欲生。这孩子，五岁的孩子，带着他对军队的向往永远地走了。正好解放军报一个摄影记者在场，抢拍下这催人泪下的镜头。我看到这张照片时，灵魂起了风暴。我问自己：难道我们对

军队的感情还不如这个五岁的男孩子吗？

(久久停顿)

不说了，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六·四”过去两个月了，余波仍在。这个余波，将震荡中国一百年，或许不止一百年。国内国外，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谈所谓平反的问题。人们虽不希望历史重复，但历史总是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重复。对待“六·四”，我们应当正视它，研究它，而不是害怕它。害怕是没有用的。这段时间，我们总好像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中，仿佛做了亏心事似的。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吾尔开希、柴玲等人永远不会在中国找到他们的位置。有些人也未必

会在历史上排到什么好座次。将来对“六·四”的说法会有很多。人们将会很好地利用“六·四”这个武器。有人在“六·四”发生时就想利用它；有人在“六·四”后不久想利用它；有人会在将来利用它。

起 因

有改革才会有“六·四”。但改革并不是罪人。邓小平发动的改革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其意义毫不亚于毛泽东的雄鸡一唱天下白。本世纪拯救中国的一共有三个人：孙中山、毛泽东，再加上邓小平。这三个人在中国三个不同时期掀起了三股滔天的巨浪。浪淘历史，写尽风流，却不免泥沙俱下。每一次伟大的运动总会有副产品。袁世凯是副产品，国民党“四·一二”大屠

杀是副产品，文化大革命是副产品，“六·四”也是副产品。历史最爱捉弄人。副产品往往产生正面效果。“四·一二”大屠杀使共产党真正崛起，文化革命使中国人民彻底觉醒，“六·四”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充满了矛盾。邓小平是集西方观念和东方观念为一体的人物。毛泽东最大的局限性是不了解外国，而邓小平则近距离观察和解剖过资本主义。他更解剖过中国。他创世纪地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才是真正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的思路有冲突。轻时闹点不痛不痒的小毛病，重时就酿成火山之势。

一、新兴阶级与政府的矛盾。“六·四”事件有个显著特点：得益者造反。这是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怪事。邓小平女儿邓楠曾流着泪说：“他们（指积极参与‘六·四’运动的人）忘恩负义！”

如果没有我老爹，哪有他们今天的好日子！”她无意中触到了问题的本质。这话要从头说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复出，一批被打倒的干部也随之而出。这些人全都在重要省份上任职，如赵紫阳治蜀，万里治皖，胡耀邦入主中组部，待他们干出成绩后再进中央。这些人有合作，有竞争，也有淘汰。孰优孰则上。这些人已明白中国政治上的格局，都看到下一步政治的走向，因此，他们都决心在“封地”一展雄才。但隐忧也就此埋下。一来这些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二来为着出“实效”，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是“短期行为”，而这一点又主要体现在农村政策上——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是私有制最原始的形式。这样做的好处是：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坏处是：将三十年间辛辛苦苦建立的集体所有制破坏殆尽，并为思想上的分化打下了基础。由于这类“短

期行为”见效快，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大江南北已传遍这样的口号：第一，要吃粮，找紫阳；第二，要吃米，找万里；第三，胡耀邦是青天大老爷。在邓小平的冀鲁豫旧部属中，这三个人最终成了气候，同时也形成了他们“三分天下”的局面。在这三人中，又以赵紫阳最是实用主义者。纵观他几年的行为，我帮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只要近期得利，中、远期目标统统不要。短期内把经济搞上去，树立良好形象后，再说其它的。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干脆留给子孙解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新兴的阶级诞生了。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称这个阶级为“暴富阶级”。这个阶层在党内有，党外也有；政府内有，政府外也有；军内有，军外也有。特别是一部分高干子弟，更是这个阶级的中坚。这些人的运作方式是：打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幌子，借用生产经营的渠

道，利用手中的权力，钻了国家体制、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几年内敛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的资本积累速度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速度。这个阶层虽小，但能量甚大。他们政治上有代理人，就是赵紫阳；思想上有代言人，就是那些知识界的“精英”们；国际上有同盟者，当然是以美国为龙头的西方阵营；社会上有基础——那些个体户们。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以关系获取权力，以权力换取财富，再以财富打通各种关节，直至夺取最高政权。自 1988 之后，这个阶层已开始向权力机构运动，其运行轨迹十分清晰。从长远看，中国是需要有一个中产阶级的。但中产阶级的分娩需要漫长的过程。目前大众贫困，一部份人暴富，只能激化矛盾。双方的心态都是畸形的。新兴阶层欲保住他们的所得，非要夺权不可。人民则处心积虑要摧垮这个阶层。政府要调和矛盾。三

方缠斗，终于兵戎相见。尤其是，政府在1988年北戴河会议上制定出一套治理整顿的政策，更是触犯了新兴阶层的利益，他们再也不能等待了。

二、人民群众与政府的矛盾。中国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出现了危机。社会主义已经到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这一危机的标志是：群众“没气了”。其意是：精神垮了。信仰危机再加信任危机，思想已处于混乱的边缘。三年灾害时期，饿死那么多人，生活那般困苦，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像坚信父母一般地坚信党，几年内扭转乾坤。现在人们的生活比那时不知奢华多少倍，却每每“放下筷子骂娘”。党风腐败，权威丧失。子女干政，秘书干政。人情大于山，王法薄如纸。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没关系绝对办不成事。中央坚决反腐败，而腐败坚强。中央寄希望于推出榜样来使局面改观，殊不知榜样的力量是苍白的，

制度的力量才是无穷的。清官无用。十年来，一部分人民群众养成了两种心态：①党内没好人，只有坏人中的好人。②贪官污吏皆曰可杀。愤怒的种子埋在他们心底，一遇阳光雨露，即可发芽。

谈到人民群众，不能不谈谈知识分子。“六·四”的发生与知识分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知识界精英们早在几年前就在为这一天造舆论。“六·四”期间，知识分子也确实在某段时间内起了主导作用。麇集在赵紫阳周围人的人也大都是知识分子。成事需要秀才，败事也往往秀才。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在“六·四”事件中也暴露无遗。中国知识分子实在太成熟了。他们与执政者的关系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拼命歌颂，二是拼命谩骂。有时候他们像文化革命中的民主党派，在严密的监视下自由活动，永远不执政而为执政党服务；有时候他们像北京市民，一触即跳，伸手在你脸抓出

几道血痕。在他们的心目中，执政者有两类人，要么强，要么弱。他们遇强则弱，遇弱则强。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其实对人民又何尝不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太想领导些什么了。就拿他们在广场上的表演为证：学潮之初，他们想当政府与学生间的“调解人”，继而又当“军师”，既当学生的军师，也当赵紫阳的军师；学潮中期，他们赤膊上阵了，“五·一九”知识界大游行，一个个披红挂彩，俨然功臣；广场被军队攻克之后，他们作鸟兽散，留的留，跑的跑。留下来的拼命歌颂，跑到国外去的拼命谩骂。他们永恒的悲剧在于既不能求同，也不能存异。他们始终形不成一个坚强的群体。他们最想利用别人，而恰恰正是他们最容易被别人利用。

三、紫阳跳梁。“六·四”事件，赵紫阳始终是个关键人物。没有赵紫阳，

不会有产生“六·四”的土壤；同样没有赵紫阳，“六·四”也不会演变成这样一个惨烈的结局。赵紫阳虽不是学生的代表，但他是新兴阶层的代表。学生要的是所谓的正义，新兴阶层要的是政权。赵紫阳要的也是政权。赵紫阳曾无限感慨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要改革，手上没权不行啊！”这不禁使人想起江青的口号：“权权权，命相连。”赵紫阳的权力够大了，但他仍不满足。邓小平的地位是历史造就的，是人民赋予的。赵紫阳的地位则不一样。“六·四”本不至于拖延至流血，但政府内部有派，形不成拳头，打不出路数。这个派就是赵紫阳。赵紫阳本来也是站在学生对立面的。5月中旬他访问北朝鲜，与金日成谈到学潮时还骂学生“瞎闹”。5月20日，我遇见他的儿子×××，我问：“你爸爸对学生如何看？”他答：“糟透了。”我问：“他看该如何收场？”他用手做了砍头的姿势，还咬

了咬牙。我相信他的态度代表了5月20日前后赵紫阳的态度。但形势进一步发展，学潮如星火燎原，全国都嗅到了热哄哄的糊味，赵紫阳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赵紫阳是个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人，他发现政治行情异变，迅速改变策略，变被动为主动。是什么促使了他的转变？我判断是他身边的秀才。秀才的头儿是鲍彤。赵紫阳是工农干部出身，进城之后仍拂不去那一身滑县农民的土味。虽然他常常打高尔夫球，可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庄稼汉的把式。但他有一个其它工农干部不可比拟的长处：用秀才。他身边总像苍蝇一般围着一堆献计献策的钟会。看他在“六·四”期间做的“秀”，也绝不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能“秀”出来的。譬如，学生上街之初，是把小平同志和赵紫阳装在一个口袋里的。声讨官倒，声讨太子党，赵紫阳岂能榜上无名？当赵紫阳决定转向后，突然由中信

研究所抛出一个消息：赵紫阳决定拿自己儿子开刀。这个消息一下子把学生的矛头拨开了，拨到小平同志和国务院领导胸前去了。一夜间，赵紫阳遁入安全地带。舍子求进，实是鲍彤们的主张。赵紫阳是爱子的，他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为倒卖彩电的儿子辩护，厉声诘问众人：“谁拿得出证据？”自己不会决断如斯。再如，赵紫阳那天晚上去广场看学生，讲话时竟哽咽起来。这一哽咽不要紧，他蜕变成了英雄。他真的同情学生吗？就在那一天上午，他还到顺义去打高尔夫球。他在演戏。导演仍是鲍彤。赵紫阳没有这个智商，但他有这个能力：关键时能动情。该掉泪时能掉泪。这足已让许多工农干部望尘莫及了。真该颁给赵一个百花奖。赵紫阳的倒戈使局面变得复杂化了。中央出现了两个声音。政府坚定的阵脚动摇了。民运形成了这样一种气势：上有头（无形的领导）；中有

组织（知识界精英和新兴阶层）；下有广泛的基础（对政府不满的群众的支持）。和平解决事端已属不可能。5月中旬前如果能解决事端，双方都是胜利者。拖到5月下旬再解决，已不会有胜利者了。双方都是输家，只是谁输得更惨而已。

较 量

一场罕见的大对抗在中国爆发。人民与人民的政府对抗。人民与人民的军队对抗。新兴阶层要推翻的正是在这十年内给了自己巨大利益的政府。赵紫阳要取代的正是把他辛辛苦苦培养成才的恩师。各个阶层都进行了最充分的表演。

一、中央。①邓小平沉着应对。邓小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胡耀邦之死会引来如此强烈的飓风，更没想到赵紫阳会半路杀个回马枪，弄了个腹背受敌。他不

得不仓促上阵。好在他在政治大风大浪中游泳得多了，不怕呛水，胜似闲庭。他的沉稳是取胜的关键。无论形势多险恶，他始终不曾慌乱。5月25日下午，“飞虎队”驾驶百余辆摩托冲击米粮库，他正在同几个牌友打桥牌，隔墙传来阵阵啸声，牌友们握牌的手不禁发抖。邓小平若无其事，说：“好好打么，没啥子关系！”他在桥牌桌上和政治牌桌上都按自己的常理出牌，不为旁人所动，绝不紊乱。面对混乱的局面，邓小平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冷静观察。大潮之下，沉渣俱起。许多人充分表演，邓小平做了几天观众。二是抓住军队不放。事态最危急的时候，邓小平把杨尚昆召到家里，说：“军队的事，只有我和你两个人管。军队第一听我的，第二听你的。除了我们俩，谁也不能调动军队。”杨尚昆走后，邓小平又召来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副局长孙勇，对二人说：“中央警卫局只

有你们二人才能指挥，但你们二人只能听命于我。除了我的命令，谁的命令也不能听。”至此，他已立于不败之地。1976年，“四人帮”先栽在内军（8341）手中，后栽在外军（全军）手中。邓小平先通过杨尚昆掌握外军，继而通过杨德中掌握内军。内无忧，外无患，布置周密，真杰作也。②李先念先知先觉。李先念和赵紫阳同是中南出来的干部，李对赵的为人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看赵紫阳这个人有野心。”87年底，他就在邓小平面前讲过这样的话：“赵紫阳应当下台。”1988年国民经济局面不妙，赵紫阳在政治局企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李先念正色道：“你当了七年总理，两年总书记，这副担子你不挑谁挑？”针对赵紫阳“权力都跑到哪儿去了”的说法，李先念说：“你赵紫阳还没有权吗？你的权力够大了。可你是怎么用这个权的？你只知道发票子。你到衡

水的大街上看一看，储蓄所比厕所还多！”学生上街之后，遍地呼声要小平退休。李先念去看邓小平，采取激将法：“你到底退还是不退？如果你要退，我就支持赵紫阳，支持到底！如果你不退，我就支持你，支持到底！”邓小平默默地看了李先念半晌，说：“退到哪里去？退到棺材里去吗？”邓又说：“你我四十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吧？大不了上山打游击。”李先念一拍大腿：“那我就支持你，支持到底！”邓小平与李先念商定，由李先念出面做老干部的工作。那些天，李先念的住处中南海三〇三实际成了指挥部。老干部一批批来，一批批走。许多老同志见面的第一句话即为：“你死我活！”③陈云与邓小平团结作战。多年来，海外盛传，邓、陈不和，党内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这种舆论。李先念说：“邓、陈的结合，是全国人民的幸福，是全党的幸福。”赵紫阳听说此话后

说：“李先念不起好作用。”其实我清楚，邓小平和陈云虽然有争论，但这种争论属思想方法之争，工作之争，毫不波及其它，“像清水一样”（陈云语），不掺杂个人私欲。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把国家搞好。这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人品高尚，公心为上；二是建立在深重的革命友谊基础上。倒是这二位老前辈都是性格倔强之人，纵是观念之争，也轻易不服人。叶剑英称共产党内有两上“钢铁公司”，一为邓小平，一为陈云。钢铁碰钢铁，铮然有声。“六·四”前陈云有一次曾开玩笑说：“我再也不见邓小平了。他就是要死了，用担架抬着来看我，我也不见！”但大敌当前，家务事统统扔在脑后。党这条舟一旦翻了，哪个生存？在关键时候陈云向邓小平伸出了温暖的手。动乱甫起，陈云就讲了这样的话：“我对邓小平有这样一个评价：三个还是，即还是搞马列主义的，还是搞

社会主义的，还是搞公有制的。”他还说：“进也是支持邓，退也是支持邓！”在李先念的鼓动下，他去见邓小平。正值中午，尚未吃饭，他是揣着面包去的。见邓之后，他说：“过去的账一笔勾销！”邓、陈一旦联手，便形成团结的力量，占据了中央大多数。赵紫阳不易取胜了。

二、赵紫阳。赵紫阳走了三步棋：①在政治局撂挑子。在他从朝鲜回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表示：“我对小平同志（关于动乱的）指示没办法执行。”李鹏总理责问道：“几天前研究‘四·二六’社论，你不是还同意嘛。”赵紫阳说：“反正我没法干了。”赵转而对杨尚昆说：“尚昆同志，我辞职。”杨尚昆笑道：“我哪有权力批准你辞职？”赵紫阳说：“那我就请假三天！”这一闹，是把自己从邓小平的营垒中划分出来。这预告着，下一步他将有更大的动作，只是政治局衮衮诸公当时尚未注意到。②在会

见戈尔巴乔夫时抛出邓小平，暗示中共还有一位大家长，任何事情还都得听这位大家长的。这一手很毒，邓小平他老人家一下被推到了前台，西方人说这是“审判台”。李先念在看电视时就气愤地说：“这是出卖朋友！”王震说：“赵紫阳把小平同志放在火上烤！”③不经政治局同意，擅自到广场看望学生，捧了一掬鳄鱼的眼泪。我还觉得，广场上学生绝食也是赵紫阳智囊班子的主意。回顾“六·四”，绝食实在是非常关键、非常高超的一步棋。这一步，一下把运动推向对抗的边缘，激起了全民的愤慨，使政府陷于被告的境地，并昭示着事态将是你死我活的结局。这一着棋，绝不是学生想出来的，这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胆略。

赵紫阳看似潇洒，一招一式均显露着才华，但他毕竟只赢得了局部，输掉了全部。这是因为：①他的起点并不高。

假如他真的要在中国推动民主，那么他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也倒可以理解。而他的目的却只是自己更上一层楼。他关心的不是民主，更不是学生，而是他自己。他要反掉的不是旧框框，而是他所说的“大家长”，而他想当另一个大家长。有一明证：“六·四”夜间，军队已杀开血路直逼天安门广场，赵紫阳派手下人向广场的学生领袖们送信：要坚持到天亮。一旦天亮，历史必将改写。谁都能看到这一点。问题是，捱到天亮，天安门又将流几多血？有人是想用学生的血来为自己的桂冠洗礼。了解了这样的动机，再来看他的倒戈，显得就不仁不义了。他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何以服天下？②赵紫阳一味听信秀才。这本是他的长处，这次却变成了短处。秀才们曾造就了他，秀才们也害了他。秀才们帮他谋划的每一个小主意都是玲珑剔透的，但大主意却臭了，那就是错

误估计了形势。秀才们怀着赌搏的心态。鲍彤曾豪迈地说：“赌得赢则开国，赌输了则倾家荡产！”可6月的北京并不存在着赌博的牌局。邓小平尚在，李先念陈云也在。“勤王”之师正源源开来。几个秀才拥着一个光杆司令，哪能摆布历史？顺便说一句，他们尤其低估了陈云与邓小平合作的可能。他们只知邓陈不和，却不知在党国有难时，邓陈可和，邓陈已和。③军队不在赵紫阳手里。

三、学生。学生永远是幼稚的。学生们盘踞天安门广场长达五十六天，最后溃败，茫然无主，一筹莫展，是历史的必然。天安门广场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中国革命的一切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它有关。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以后中国不出事则已，若出事，还是会出在广场。学生们的溃败固然与赵紫阳诱奸他们有关，但自身素质低劣却是最重要的因素。①学生们的思想与

口号都是充满矛盾的。一个美国人说：“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没有结局，因为没有目标。”他们一方面反对所谓“专制和独裁”，一方面却又要与他们反对的一方对话，寄希望于人家的宽大和“怀柔”。他们表现了要与对手决一死战的气概，而在这种时候他们却偏偏长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不起，为的是把一封信送到总理手中，这实在太有讽刺意味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运动远不如十三年前那场运动来得深刻。那场运动的矛头十分明确。历史是无情的。时间向前推移了十三年，北京人又一次在同一个地方倒下，虽然倒下的人更多，但仍是原地踏步。学生们根本不懂得改革，根本不懂得共产党，甚至根本不懂得中国。如果说学生运动开始时还有一些理念的话，譬如反腐败，反官倒，而愈到后来，则愈来愈情绪化了。广场已经成了非理性的广场。这是一种混不下去又非混不可的局

面。整个人群被情绪带着走，情绪被谎言带着走。谁最强硬谁最有发言权。谣言最强硬。一位美国记者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天听到的谣言比一生中听到的还多。”撒谎、不诚实是学生灵魂上的癌症。②反腐败中的腐败。首先是权力的诱惑。中国人充满了权力的欲望。学生们哪能免俗？广场上争权夺利。那几天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广场上的“总指挥”多如牛毛，无论阿狗阿猫都想来抖抖威风。“六·四”当夜，总指挥们消失了。“六·四”后，相同的情况出现在海外，个个都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广场上的领袖”。其次是可悲的重复。学生们喊出了“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口号，而这和文革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何其相似。他们从对皇帝的效忠变为对主席的效忠，从对主席的效忠变为对广场的效忠。学生领袖们在海外捐赠下大把地挥霍。革命尚未成功，

女人已在怀中。绝食是假的，性交是真的。军队攻克广场后清理学生的帐篷，发现有两样东西最多，一是避孕套，一是“天安 851”营养液。由于学生们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无法在 89 年完成改变现状的使命。他们想学“五·四”，想学“四·五”，但画虎不成反类猫。天安门广场最高潮时曾达到近百万人，但那充其量是人海，而不是洪流，无法冲垮什么。学生空有理想，而没有踏实地去铺设通往理想的途径。学生失败，实属必然。平心而论，任何一场运动让学生来唱主角，本来就超越了他们自身的承受力。不过我认为，通过“六·四”，学生们会改变很多。他们今天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明天的听话。我们今天的胜利也不代表明日的安宁。这些学生终是我们的心病。我曾去过秦城监狱，那里关着许多学生，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才十八岁。我想我们这下子造就了一批职业

“革命”家。你就是判他们二十年刑，出狱时也不是三十岁、四十岁，可够咱们受的。

四、群众和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群众和知识分子在“六·四”事件中起了推波助澜和挑拨离间的作用。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充斥着激进情绪，从文化的激进到政治的激进。这种情绪对社会的破坏力很大，建设力则很小。每一次运动都是政治激进的产物。这种情绪在“六·四”中更表露无遗。学生在广场起事后，知识分子和群众中劝架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出谋划策的。“六·四”那几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整个北京上至机关干部下至小商贩都沉浸在一种挣脱多年压抑的痛快和亢奋的情绪中。学生们喊出“毕其功于一役”和“七十年来的总决战”等激进口号，这并不是几个激进学生的行动引导出来的，而是全社会的集体心理情绪。中国

人被压抑了多年，突然一下可以讲真话了，那种被解放的快感似脱疆野马，一泻千里，最终形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5月17日以来的几次大游行，名义上是声援在广场绝食的学生，但示威者个个双眼放光，神采飞扬，像在参加开国大典。许多人觉得天要变，天已变。后来北京老百姓拼死抵御军队入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不愿意重归旧秩序。“六·四”前夕，最希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坚守的不是学生，而是市民。很多市民去广场劝学生坚持到天亮，说：“你们再坚持下去，工人们就会起来。”北大教师开会派代表去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今晚撤了，今后休想我们来支持你们。”我曾问一位作家：“你们这样做究竟图什么？”他说：“现在不出来表态，搭上民主这驾马车，等中国大局已定，政坛上就没有我们的位置了。”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投机思想。他们不懂得，如果不问

条件，不计代价，以急变的方式推进民主，必会给中国带来一场灭顶之灾。至于一部分北京市民在“六·四”中的表演，我认为不值一提。北京独特的文化传统使北京人在这次事件中更像北京人。北京有欢迎征服者的传统。明朝以降，北京从未有过一次像样的保卫战。远不像其它中国名城，每次易手都那么惨烈，残酷。北京人欢迎过李自成。欢迎过八旗铁骑。八国联军也未遭抵抗。日本人进城，北京人老实得像兔子。在这次事件中也如此。“四·二七”和“五·四”大游行，学生占尽上风。北京人拼命捐钱捐物。“五·二〇”堵军车，学生又赢一轮，北京人紧跟不舍，尽情羞辱当兵的。6月3日，拦军车，如汹涌潮水。听说打橡皮子弹，勇气如山。真开枪后，顿如惊弓之鸟。大军克城之后，他们又真诚地转变。他们先猛烈犒军，到几个战士牺牲的地方送花圈，真诚地失声痛

哭，尔后掀起大规模的举报之风。

五、军队。“六·四”事件有一个重大特征：农民根本没有动，工人基本没有动，军队动了。这场较量如果没有军队，一定满盘皆输。6月4日凌晨，军队攻克天安门广场。他们是突破十几万人的重围杀进来的，险些进不来。成败决于呼吸之间。一夜惊涛。世界开了锅，中国却一片死寂。死寂中酝酿着更大的风暴。那天上午，北京城电话全部不通，是因为所有的电话都被使用的缘故。数万大军聚集广场，包围广场的是亿万颗不明真相的人心。这时候，如果天安门广场有一个排，不，一个班，甚至一个人跳出来，局面一发而不可收。但中国军队毕竟是一支听党的话的军队，硬是没有这个人。这还要归功于毛泽东。他的“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到6月4日中午12点时，危险过去了，生力军源源开来。

“六·四”以政府胜利、学生失败而结束了，但西方亡我变我之心不死。新兴阶级依然强大。他们只不过是改换了手法罢了。有人提出十六个字的口号：“促进量变，等待质变；上山（出国）下海（经商），各尽所能。”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六·四”是一把双刃剑，使双方都受创。从“六·四”的第二天起，新一轮的较量业已开始。